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6.022

# 布哈林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

仲 帅

(哈尔滨工程大学 思政教研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布哈林和葛兰西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两人自然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布哈林和葛兰西所处的历史境遇不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两人自然对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思考和主张也不尽相同。这种认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方法上。对布哈林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深入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反思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布哈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6-0156-05

葛兰西在1929年开始写作的《狱中札记》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中外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广为人知。“以至于国内外学界都不由自主地将葛兰西的理论当成某种经典的范式。”<sup>[1]126</sup>事实上,布哈林早于葛兰西之前于1925年写作的《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并详细论述了取得领导权的具体方法。该文曾在苏联《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公开发表。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葛兰西曾经阅读过布哈林这篇文章,但是,在形成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初期,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一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批评性论述,有学者认为,葛兰西“与布哈林学说的批判性对话对他的学说(指文化领导权思想——笔者)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sup>[2]183</sup>尽管布哈林和葛兰西所处的历

史境遇不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对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布哈林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之间也存在某种历史的联系,对布哈林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反思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文化领导权的提出

1923年,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一文中分析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文化上的垄断,使得无产阶级不可能形成比资产阶级更加先进的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绝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sup>[3]346</sup>因此,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必然会面

\* [收稿日期]2014-05-1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HEUSZB1406)、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HEUSZB2206)

[作者简介]仲帅(1988—),男,江苏徐州人;哈尔滨工程大学思政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对文化上较高的阶级的消极怠工,这造成了革命的巨大耗费。此外,无产阶级要有效管理国家需要借助其他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一个在文化上落后的阶级不可能长期统治文化上较高的阶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存在蜕化的危险。1925年,布哈林在《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文中分析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可能性和现实要求。他指出,因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和苏俄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掌文化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文化领导权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现实要求。

因为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巨大鼓舞,葛兰西在政治上从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转变为共产党的革命主义。此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效法苏俄进行革命斗争,却接连遭到失败。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失败了,却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成功呢?葛兰西分析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与政治上层建筑并列的哲学、艺术、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市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地带,能够说服人民自觉地服从国家的统治,从而确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sup>[4]38</sup>葛兰西指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重要区别在于市民社会是否成熟。在东方社会,工业经济不发达,依然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还尚未成熟的状态,国家主要依靠政治权进行统治,因此,在东方社会,无产阶级可以直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普遍确立,市民社会已经成熟并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统治除了“暴力”,还有“同意”,因此,在西方社会不可能仅仅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

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市民社会的正当性也将日益消解,整个统治阶级及其体系也将趋于涣散。

## 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方法

布哈林和葛兰西从各自所处的历史境遇、面临的历史任务提出的文化领导权在内涵上不尽相同。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着眼于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在布哈林看来,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就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能力、影响力和潜在力量。葛兰西面对西方特殊的社会结构,着眼于占领资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其实质是“通过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取民众的自愿接受和‘同意’”,从而为夺取政治领导权确立合法性基础。由于对文化领导权内涵的认识差异,决定了两人在取得文化领导权方法上的差别。

### (一) 正确对待和利用知识分子

布哈林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了要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路人”。“同路人”的概念是由托洛茨基最早提出来的,指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可以引申为知识分子。布哈林指出,因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还没有成熟起来,因此,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甚至无产阶级政党都要选择“来自其他阶级、首先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人作领袖,而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避免的”。<sup>[3]83</sup>布哈林反对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既没有丝毫分寸感,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的方法,主张通过改造和和平排挤的方式,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要求知识分子“按照新的原则,按照新的无产阶级思想指导自己”,<sup>[3]92</sup>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服务。对那些不合作甚至搞破坏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和平排挤的方式,从文化领域中予以“驱逐”。

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主张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取得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制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知识阶层会将自己的同质性和功能性认识赋予产生

自己的这个社会集团。葛兰西指出“有机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性。任何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自己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取得文化领导权,需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还要同化和争取传统知识分子。葛兰西分析了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和同化传统知识分子的辩证法:“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成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sup>[4]5-6</sup>二是与人民大众的有机性。葛兰西论述了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有机知识分子教育和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随着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在数量和质量上壮大和提高有机知识分子阶层。

## (二) 坚持党的领导和培养文化干部

布哈林指出,取得文化领导权,要加强党对文化斗争的领导。共产党人在文艺政策上要避免两个错误,一是丧失立场,二是共产党人的自大狂。丧失立场对于文化事业的伤害将是致命的。在文化事业上不坚持党性和阶级性,文化发展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共产党人的自大狂是列宁深恶痛绝的问题,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自掌握文化领导权,哪怕是一个文化部门,但是,一些共产党人却自大到可以对文化事业指手画脚,违背文化规律和对具体业务横加干涉。布哈林指出,要纠正这两种错误,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二是要努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良的文化干部队伍,即“造就出身于劳动人民本身的有高度技能的干部。”<sup>[3]93</sup>布哈林进一步指出,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是路线、方向、原则的领导,是一般的、总的领导,不是具体领导。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文化政策,其原因是:第一,党暂时还不能实行全面的领导。布哈林说:“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sup>[3]349</sup>第二,文化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文化工作的专业性和专门化要求党实行宏观领导。

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紧紧依靠

党组织的力量。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承担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责任,包括夺取并且是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葛兰西指出,党组织的基本职能“归结起来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sup>[4]428</sup>因此,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党的精英人物,并与有机知识分子相结合,构成夺取文化领导的骨干力量。党组织和党内精英还必须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努力提高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这种精英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且还同群众保持着接触”,<sup>[5]22</sup>促进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化。党组织领导党内精英人物和有机知识分子战斗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人民群众在文化观念上的不断觉醒,会促使市民社会的功能日渐丧失,这势必动摇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葛兰西认为,建设先进的党组织和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途径。

## (三) 文化革命的策略选择

布哈林主张在文化上展开最广泛的竞赛。之所以开展文化竞赛活动,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文艺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和不同的流派,只有通过竞赛,才能促进不同文艺竞相发展。第二,竞争是创新的基础,通过开展广泛的竞赛,才能促进文艺创新,形成文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因此,布哈林强调要为文艺竞赛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他还指出要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只要坚持在党的一般路线指引下,布哈林鼓励说:“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sup>[3]351</sup>布哈林将竞赛看作是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

葛兰西指出,夺取文化领导权,不可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不能指望搞运动战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只能是反复较量,通过开展阵地战,“由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引导、说服等方式,渐进的‘散漫的’‘毛细管式的’进行长期渗透,依靠被

统治阶级的同意和服从, ”<sup>[6]</sup><sup>161</sup>一点点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自己的文化十分困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凭借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领导权,牢牢占据着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本身受到剥削和压迫,在文化领域上没有话语权,加之自身文化水平较低”,<sup>[7]</sup><sup>162</sup>取得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 三、结论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和葛兰西都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都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两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自然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但是,布哈林和葛兰西处于的具体历史境遇不同、面临的历史使命不同、具体的革命实践不同,两人的一些具体思考和主张也不尽相同。从上文所做的具体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性认识。

第一,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问题。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布哈林和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有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布哈林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仅仅取得了政权,取得政权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文化领导权。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布哈林提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任务,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葛兰西则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视角出发,认为取得文化领导权是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目的是通过文化领导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总之,布哈林和葛兰西在提出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的重要区别是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问题。在东方社会,是先取得政治领导权,后取得文化领导权,政治领导权是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前提和保障。在西方社会,是先取得文化领导权,后取得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取得政治领导权的首要任务和唯一途径。

第二,依靠哪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取得文化领导权问题上,布哈林和葛兰西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都提出利用传统

知识分子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不同之处在于,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展出比资产阶级更为发达的文化,产生和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有限,而且十分困难。因此,如果在短时期内取得文化领导权,主要方法还是通过改造旧知识分子。随着无产阶级文化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之后,再慢慢将旧知识分子“排挤掉”。其实,布哈林敢于依靠旧知识分子,他的信心和胆量来自于已经掌握的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在取得文化领导权问题上,已经做好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存在,而且可以通过党组织和群众运动进行培养。他把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上。总之,依靠哪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去取得文化领导权,这是布哈林和葛兰西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区别。

第三,在文化领导权目标选择上的“立”与“破”。布哈林和葛兰西在取得文化领导权问题上都坚持党的领导,都强调培养党的文化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在布哈林看来,党对文化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培养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干部队伍。在葛兰西看来,党对文化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制定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政策和策略,培养和造就党内精英和有机知识分子,带领群众去破坏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总之,布哈林和葛兰西都强调党对文化的政治、组织和思想领导,区别主要在于目的上:一个是“立”,即取得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一个是“破”,即破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确立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

第四,在文化革命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意识形态斗争具有特殊性,布哈林和葛兰西都反对采取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都强调在文化革命中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布哈林认为开展最广泛的竞赛,是实现文艺发展和创新的绝佳途径。但是,这种文化发展上的大胆和自信,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坚持党的一般领导。葛兰西面对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重重困难,主张在文化领域开展长期的“阵地

战”。这种阵地战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由于不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势,从一开始就十分困难。所以说,正是文化革命决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决定了文化革命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

#### [参考文献]

- [1] 黄卫星,李彬.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2] 邱运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中介与形式内涵——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文艺问题[J].马克思主

义美学研究,2005(08).

- [3] 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上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4] 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 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6] 李瑶.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J].世纪桥,2010(01).  
[7] 陈坤,仲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意蕴[J].理论探讨,2013(04).

(责任编辑:杨 睿)

##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ultural Leadership between Bukharin and Gramsci

ZHONG Shuai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Both Bukharin and Gramsci are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arxist theorists, ever worked 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o they have similar or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s cultural leadership. Bukharin and Gramsci had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took different historic missions, so their concrete reflection and opinions on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are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This recognized difference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real methods to obtain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comparison of the ideology of cultural leadership between Bukharin and Gramsci helps to study the core problem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to rethink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Chines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Bukharin; Gramsci; cultural leadership